

2020年,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整整8年,距离他出版一部长篇小说《蛙》也已过去整整10年。

7月31日晚,围绕自己的新作,莫言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、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、央视主持人王宁一起进行了一场线上文学对话。

“晚熟”是一个褒义词

何为“晚熟”?莫言给出的解释是:希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,而不要过早的成熟、定型,使自己的艺术生命、创造力保持得更长久一些。

谈及为何要写“晚熟”的人,莫言认为,一个作家要写什么,有时候不完全由作家自己作主。

李 青

莫言：“诺奖”八年后，愿做一个“晚熟”的人

内心所想。《晚熟的人》系列故事中的很多原型都是他的朋友,甚至是像孪生兄弟一样的知己。

莫言与“莫言”的对视

在书中,莫言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,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“诺奖”后的生活。

对李敬泽而言,书里最让他触动的是这个叫“莫言”的人。书中描写了很多人物和世间的故事,但在一定意义上,也是这个叫“莫言”的人的故事。

莫言将书中的“莫言”当作自己的一部分,“我之所以敢把真实名字放到小说里,其实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。

但是,这个“莫言”很复杂,有着太多的况味。莫言说,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以“知识分子返乡”这一视角观察生活。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视角本身正发生变化,莫言看问题的角度与30年前不一样,与10年前也不一样。

夸张之后的真实故事

被问及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,莫言坦承都是夸张后的故事,他说这是作家的“看家本领”。

在毕飞宇看来,“书中的莫言角色带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成分。”他认为莫言小说里面人的名字特别有意思。

虽然书中人物是夸张的结果,但莫言认为,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看到身边人,或者看到自己,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最大的安慰。

“老和尚”与“两个心脏、四个胃、八个肾”

谈及莫言的写作,李敬泽认为,如今的莫言有“老和尚之势”。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阅读《红高粱》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李敬泽说他并没有看懂。



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追求。有一句老话叫做“真佛只说家常话”,一个和尚开始念经的时候云山雾罩,最后发现老和尚只说家常话。

毕飞宇则夸张地说:“莫言有两个心脏、四个胃、八个肾。”

有这么多的脏器在提供能量。”毕飞宇谈到,这本书中的《红唇绿嘴》《火把与口哨》是标准的莫言式作品。

部分观众提问:

Q1:可以推荐一下您最近在看的书或者影视作品吗? 莫言:这两年,我一直在大量阅读地方志,譬如我老家周边的十几个县市编写的文史资料。

李敬泽:这个事特别有意思,因为我特别喜欢到处搜集文史资料,现在已经装满一书包。

Q2:我想成为一名网络小说家,但是父母很反对,认为写网络小说没有稳定的收入,请问当初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,家人有没有支持,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?

莫言:我一直反对不把网络文学当文学来看,把纸质的书当成网络文学,把网络文学当成通俗文学,这种划分是不准确的。

间越长,遇到的困难越多。我写了40多年,难道没有困难吗?我现在举步维艰,比80年代初写的时候困难多得多。

随着了解的文学越来越多,我已经知道很多人曾经怎么样写过,起码不应该重复别人用过的创作方法;其次,我自己的作品积累也越来越多,我的最低要求就是不再重复曾经写过的东西。

Q3:怎么理解文学最大的用处是没有用处?

莫言:文学跟科学不一样,科技发展可以带来新的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,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,但是文学几千年来,发展变化比科学的发展小得多。

李敬泽:在中国文化中,文学传统几乎是一个支撑性的精神构造,它对我们是起支撑作用的。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,不管我们对文学的具体理解是什么,我们永远是在文学中解决“晚熟的人”的“人”字。

7月25日,在第五届abC北京艺术书展论坛环节,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、一页出版folio主编王恰恰、十三邀联合制片人刘晋锋共同带来一场关于“小众出版”的讨论。

“小众”“大众”之争

与外界对“一页”出书常常自带热度和话题的认知相反,王恰恰对“一页”的出版定位是“小众品牌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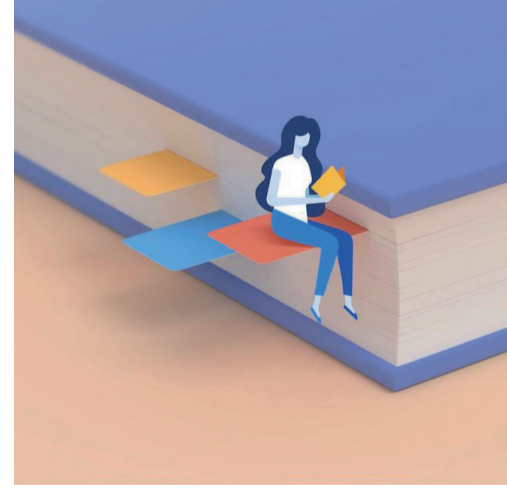
罗丹妮在到单向空间任职之前供职于理想国。在她的职业经验中,似乎并不觉得“小众”或“大众”是一个很重要的争论。

“营销”污名化之思

前段时间,就出版界“蹭流量”的批评,豆瓣上甚至一度掀起论战,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。

杜 佳

“小众出版”是个伪命题吗?



过任何计划和安排,她本人尚且是在事件发生后,从媒体朋友分享的照片中得知“意外惊喜”。

能猜到为什么《冬泳》能够“破圈”并分析了其中逻辑。除了纯文学写作,班宇还写过不少乐评和影评。

在罗丹妮看来,作家班宇也好,当初理想国策划出版《冬泳》也好,事先并不抱有营销的念头。

罗丹妮平时非常鼓励所接触的创作者在公共空间、公共平台展示和分享自己的作品。

内容传播看作与友情分享类似的行为,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,这也正是社交媒体本身的魅力之一。

“不朽”“速朽”之辨

书是特殊的产品,出版是一个多环节协同运转的行业,一个“好产品”的诞生往往需要参与其中的各个环节的综合作用。

刘晋锋在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疑问,现在出版社做图书周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规动作。

对此罗丹妮提出了自己的判断,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变数、充斥着焦虑的时代,因此人们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抗内心的焦虑。

事实可能愉悦得多。对做书的人来讲,开发与核心产品相关的周边是匠人乐趣的延伸,对读者而言,使用和体验则可能是阅读乐趣的延伸。

罗丹妮着重谈到,对照书籍本身和周边产品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小规模思辨,不容忽视的是,做书的方式有千万条,但最终做书这件事还是要回到个体的现实生活中考量。

“重新审视”抑或“耽于想象”:个体思想不再仅仅靠书发光

时代赋予一切事物专属烙印,做书和阅读也不例外。在这次以出版活动为中心的谈话中,刘晋锋自然地谈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。

王恰恰认为,重现追捧纯文学的盛况几乎不可能。新时代文化生活空前多样丰富,与此同时,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也是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。

罗丹妮谈到,人们大可不必为书籍本身和周边产品的关系而感到困惑。一定程度上,书籍是“永恒”的、“不朽”的属性。



欢迎关注中国作家协会 www.chinawriter.com.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协会合办